「與人類學共舞」專號
考古人類學刊・第 88 期・頁 1-8・2018
DOI:10.6152/jaa.2018.6.0001

導　言
與人類學共舞

林 瑋 嬪*

近年來，我們所熟悉的學科界限有逐漸越模糊的現象，這與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文化越來越複雜密切相關。在這個發展趨勢中，我們若仍以過去習慣之單一學科的角度進行研究，往往很難面對現象的複雜性。相反的，學科之間若能相濡以沫，擴展本身有限的視野，則更可能帶來新的發展契機。

在台灣學術界中，過往與人類學對話最多的是歷史學。中國華南學派的崛起使得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往來相當頻繁，相關的理論與個案探討非常多。[1] 然而，除了歷史學外，人類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迄今仍非常有限。《與人類學共舞》專號的籌劃，就是面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嘗試。我們透過擴大人類學的對話範圍，探索自身與其他學科交流的潛力，尋找新的合作可能。

《與人類學共舞》的作者來自戲劇、音樂、文學與歷史。他們的文章都觸及了各自學科與人類學過去交流的歷史，並且深入分析研究個案與人類學的關係。雖然四篇文章所探討的主題、研究方法與書寫方式各不相同，作者都嘗試將人類學理論運用到他們的研究對象中。在這個導言裡，我的目的不在詳細說明各文章的內容，而是從下面幾個方向來介紹他們的研究：

1. 作者使用了哪些人類學理論？
2. 人類學理論是否對其他的學科有用？換言之，人類學是否有助於其他學科探索他們所關懷的問題？
3. 如此的合作的成果為何？是否指出未來可以繼續探究的議題？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戲劇與閾限

紀蔚然教授是這個專號作者中最早跟我開始討論的學者，他對 Victor Turner 的興趣與關注甚至引發了我組織這個專號的想法。在〈閾限概念與戲劇研究之初探〉一文中，他對 Turner 的分析相當精闢：一方面，他說明 Turner 如何挪用了西方傳統戲劇的概念來發展儀式與社會衝突的理論，另一方面，他也論述 Turner 所進一步發展出來的閾限 (liminal) 概念，如何反過來幫助我們解析戲劇文本。閾限，根據紀蔚然的敘述，是一個存在「之間」 (betwist and between) 的雙面性時空，其中死亡與生命、神聖與世俗、秩序與紛亂無法明確切割。它可說是一個省思 (reflection) 的階段，蘊含了轉型或改造的可能。戲劇做為一種藝術表達的形式往往呈現的是異於「正軌」或「常態」，介於秩序與崩解的時刻。因此，Turner的閾限概念可以更深刻地幫助我們理解劇作者的重要理念。

在文章中紀蔚然選擇了三個劇本，探討其中三種不同的「閾限樣態」，以及它們所蘊含之人性的預設、世界觀以及變遷的可能。第一類的閾限以愛爾蘭劇作家弗里爾之《在魯那撒節跳舞》為例，紀蔚然說明此類閾限時刻短暫且無長遠影響，但能呈現主角面對困境不願就範的奮鬥精神。英國劇作家邱吉爾的《九重天》則代表第二類的閾限，它表達了人們的欲望和憧憬，且種下後來改變的因子。第三類閾限在劇中世界是一種常態，因為現實與日常往往模糊不清，人物恆常處於半文明、半野蠻或半夢幻中。此一類型的閾限，對紀蔚然而言，「是結果，不是效應；是現狀，不暗示未來」，在其中也看不到轉變的可能。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劇作家品特的作品可做此類閾限的代表。

紀蔚然說明了 Turner 的人類學理論採借於戲劇，但進一步發展出來的閾限觀念又如何能反饋、有助於我們洞悉劇作家對於人性的認識與世界觀。這篇文章重要地拓展了台灣戲劇研究與人類學交流的可能，讓我們理解兩個學科的雙向互動如何可以不斷地豐富彼此的視野。

樂舞與社會詩學

呂心純教授是一個民族音樂學者。她一開始就說明了民族音樂學與人類學之間如何具有的互補關係：民族音樂學對於非結構式的社會能動表述、聆聽以及律動等身體感知等層面的研究較為專精，因此更能理解人、情感以及社會之間的關聯。人類學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社會文化理論的建構更為積極，因此，民族音樂學經常借鏡人類學，用以補足認識架構及理論基礎的缺乏。她的〈時空流轉下的緬華革命樂舞〉一文即是結合民族音樂學與人類學理論，探討緬甸華人的一個家庭表演團體—五朵金花藝術團—在 1992 年的成立時，如何透過革命樂舞的設計，提供歷史記憶的情感基礎，形塑緬華的族裔認同。

1960 年前，革命歌舞是緬華凝聚社群力量的主要方式。在多元族群雜處以及政治分歧的情境中，革命歌舞帶有華人特色又蘊含著「進步」的精神成功地凝聚了緬華族群認同。1960 之後緬甸社會劇烈動盪，排華情緒高漲，樂舞表演也隨之隱匿。1990 年後排華情緒平復後，革命歌舞再次復興，不過那時的局勢更為複雜詭譎。呂心純認為 Herzfeld (2005) 的「社會詩學」(social poetics) 及「文化親密性」(cultural intimacy) 等概念非常能說明在艱困時局中，五朵金花引領之樂舞美學所蘊含之多面、且同時外顯與內隱，充滿複雜張力的族群認同與社會情感。她說：

> 晚近民族音樂學界的相關探討…多援引人類學有關「文化親密性」、「公共性」、以及「詩學」等概念…主要的意圖是在深入音樂及舞蹈的藝術表現，闡釋這些表意形式如何在社會空間中凝聚公共情感，並在社會認同當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文化親密性」指涉社群內部共有的經驗或慣習，亦可能是不足為外人所道或不可見，但反而能用以確立內部共同的社會性 (Herzfeld 2005: 3)。這般不可見的文化親密性，在自我審查或帶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個案中，經常被用來接合音樂的語言特質。(呂心純 本專號論文)

五朵金花的樂舞在 1992 年成立後，一方面選擇某些少數民族舞蹈以契合緬甸的族裔景觀，消弭社群內部的政治分立，另一方面也企圖建構新的樂舞美學。她們從 1960 年的革命樂舞中重新出發，以共同的歷史經驗凝聚社會情感。她們也結合具有現代性意涵的管弦樂，以鋪陳緬華未來的繁榮與願景。

相當有趣的是，當五朵金花輾轉遷徙到台灣後，面對新的情境她們的表演曲目逐漸轉變為以緬甸傳統歌舞為主。不過呂心純認為她們的樂舞形式事實上仍延續革命美學風格，以「有力道」的表現方式區分她們與緬甸古典舞者，在台灣的情境中獨樹一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學、物質文化與故國情懷

> 文學研究借鑑人類學理論，早已有之。1950 年代 Northrop Frye 以神話中的四季原型對西方文類進行分類和理解；1960 年代 Claude Lévi-Strauss 關於語言系統和神話結構之間關係的研究，則是深刻地影響了結構主義文學批評；1990 年代之後，文化人類學，例如 Victor Turner 的象徵研究，則是為戲劇以及敘事研究帶來重要的啟發。而過去二十年以來在文學研究中蔚為顯學的物質研究，更是得益於人類學理論。(許暉林　本專號論文)

話雖如此，在台灣學術界中，文學與人類學的對話可說相當稀少。因此，許暉林教授能將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理論帶入明清文學董說作品的分析，並與人類學者對話的方式，在台灣可說相當少見而有其獨特貢獻。

在〈物、感官與故國：論明遺民董說《非煙香法》〉一文中，許暉林從清初遺民董說的著作中關於製香、用香以及詠香的書寫，探討香如何成為知識份子面對亡國傷痛的方式。他告訴我們董說獨創「以水蒸草木為香」是「一套遺民情境的象徵網絡」：連結了草木、（感官的）身體與故國。也就是說，董說透過撿拾摘取草木製香，在呼吸之間調和身體，再現故國氣味；香讓他為自己找到一個重新安頓自身的方式。至此，我們可說許暉林呼應了：

> 張珣關於宗教用香的研究，以 Daniel Miller 的「再吸納」理論說明宗教信徒將自身外化到具體的香、神像與香爐，再藉由吞服香灰將靈力吸納入主體自身，最終完成主體建構與自我超越。（許暉林　本專號論文）

不過，許暉林進一步觀察到蒸香所召喚出來的歷史世界，獨缺明亡之前的生活與國破之際的記憶。原因為何？他認為董說以「蒸」香的方式不但去除了「焚」香的視覺暴力，也隱蔽了內心國破家亡的傷痛。本文因此說明人如何可以透過物，連結了獨特的歷史，跨越亡國的創傷。

下一個世代的歷史人類學

歷史學與人類學長久以來的互動在學史上可說是獨樹一幟。在歷史學陣營中，科大衛、劉志偉、陳春聲、鄭振滿與丁荷生等人將歷史研究結合人類學的知識與方法，運用到中國華南地區，建立了「華南學派」。經過了多年的努力，該學派的研究方式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已成為一種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新範式。在人類學這一邊，除了華南學派的重要人物蕭鳳霞之外，台灣的人類學者，如黃應貴與林開世也致力於歷史人類學理論的探討。兩個學科長期交融的過程，由華南學派新生世代—李仁淵教授—來撰寫回顧性文章，格外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

李仁淵在〈田野中找歷史：三十年來的中國華南社會史研究與人類學〉一文以簡鍊的文字描述這個歷史學與人類學共舞的過程。他也增加了不少有關華南學派鮮為台灣學者所知的背景知識，使得這篇回顧文章繞富可讀性。李仁淵在文章最後未來展望部分，以大貫惠美子 (Ohnuki-Tierney 1990:23) 整合歷史與人類學研究的看法，指出未來的歷史人類學應能更加關注到歷史過程 (historical process)、歷史心性 (historicity) 與歷史書寫 (historiography) 三個層次。其中，他對歷史過程的討論特別能引起人類學者的共鳴。他說：

> 由經濟社會史發芽的歷史人類學長處在經濟與社會層面的分析，對文化以及文化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著墨較少，以至於許多歷史變遷上的解釋欠缺文化層次；而若純粹以經濟社會因素解釋，則有將人類行動全視為理性選擇的危險。（李仁淵　本專號論文）

李仁淵事實上說出了我在閱讀華南學派作品時，心中經常出現的的疑惑。也就是，華南學派鮮少深入關注文化層面，對人類行為往往有著理性選擇的預設。由於這些看法與人類學的基本概念有差距，人類學者並不易與華南學派有進一步對話。不過，這些概念或預設也並非只是華南學派學者才有。人類學者 James Watson 在他重要的〈神明標準化〉(1985) 一文對於人們為何選擇天后信仰也蘊含了類似的預設，如此的觀點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當代的漢人研究。因此，兩個學科之間未來若能要有更多的突破與合作，可能必須共同面對這些問題。

在一個專號中能夠同時請到戲劇、音樂、文學與歷史專家與人類學交流相當不易。四篇文章的作者也突破自己習慣的分析方式，在寫作上做了不少新的嘗試。我們相信這些努力讓我們看到未來更多合作的可能，且對下一個世代的研究充滿期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　註

1. 華南學派累積的研究非常多，可參見科大衛 (2004)、蕭鳳霞 (2009)、劉志偉 (2003)、鄭振滿 (2016)，台灣人類學者的「歷史人類學」觀點，見黃應貴 (2003, 2004, 2005)，林開世 (2003)。 不過，上述這些文章也僅是眾多研究中的一部分。

參考書目

林開世

2003〈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對話？一點反省與建議〉，《台大文史哲學報》， 59:11-29。

科大衛

2004 〈告別華南研究〉，《學步與超越：華南研究會論文集》，9-30。香港：文化創造。

黃應貴

2003 〈專題導論：人類學研究的歷史化〉，《臺大文史哲學報》59:1-10。

2004 〈歷史與文化：對於「歷史人類學」之我見〉，《歷史人類學》 2(2):111-129。

2005 〈再談歷史與文化〉，《東吳歷史學報》14:1-19。

鄭振滿

2016 〈華南學者的歷史人類學：傳承與互動〉，《開放時代》4:14-17。

劉志偉

2003 〈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珠江三角洲的歷史學與人類學對話〉，《歷史研究》1:54-64。

蕭鳳霞

2009 〈反思歷史人類學〉，《歷史人類學學刊》7(2):105-137。

Herzfeld, Michael

2005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Ohnuki-Tierney, Emiko

1990 “Introduction: The Histo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in *Culture through Tim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Emiko Ohnuki-Tierney, ed. 1-2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atson, James

1985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Promotion of T’ien Hou (Empress of Heaven) along the South China Coast, 960-1960.” In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